

一幅近现代文学史的瑰丽画卷
一席激情飞扬的百年文学盛宴

一个世纪的 阅读体验

周 伟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一幅近现代文学史的瑰丽画卷

一席激情飞扬的百年文学盛宴

一个世纪的 阅读体验

周国平 主编 秋枫/白沙 编者

// 中华书局

2013年9月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印记—穿行于中国百年报刊之林丛书(第四卷 一个世纪的阅读体验)/周伟主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9

ISBN 7-80145-582-7

I.时… II.周… III.报刊—文化史—中国—现代

IV.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999 号

主 编: 周伟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1/32(880 × 1230)

印 张: 168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标准字号: ISBN 7-80145-582-7

定 价: 198.00 元(全六册, 每册 33.00 元)

文章报国 薪火相传

周伟

一张张老报纸似情感的堆积，历史的沉淀，文化的韵律。

往事如烟。100年，在历史长河中也仅是弹指之间。对于某个人或某代人来讲，却是逝去多年，渐渐淡忘。那一页页发黄的老报纸，整整100年间就这样默默地沉寂着，这是它的委屈。一旦有机会翻阅它，便会发觉它的美妙，它的深沉，它的动人。这种感觉不会随时光而流逝，不会因久远而腐朽，相反，它像一坛老酒，愈陈年愈醇厚，一旦打开来，扑鼻的是浓香，回味悠长。尤其是浪漫的怀旧情感涌上心头时，这坛老酒便愈是具备了文化的底蕴，愈是挥之不去。老报纸就是这样一坛世纪陈酿。

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都是一条链子的一个环，每一代人都是从上一代手中接过来的接力棒——薪火相传。百年老报纸就是这样，记录历史，见证时代。一代代报人笔走龙蛇，每日援笔濡墨，著述不辍。嬉笑怒骂，道出人生百态，写尽世间万象；议论风生，严谨中有风趣，诙谐中透着老辣。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老报纸的100年是前后交融的一本书，一条线。这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奋斗与抗争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生动描摹。

文章报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准则。中国报人的爱国传统历史不渝，他们理智而有豪情，勤于思而敏于行，静坐书斋而心系天下，盼望

中华富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振兴中华更成为报人关注议论的主题。他们以文报国，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文章之中，力图以事实和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强调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成为办报的主旋律。

风雨沧桑。100年间，民族报业经历过无数风霜雨雪，从不畏难，从不退缩，这种精神深深地刻在一张张发黄的老报纸上。中国的民族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经历了繁荣与萧条的起起落落，一直到现在全国拥有2000多家报纸，8000多家期刊的空前繁荣时期，从铅与火、纸与笔到光与电，从单一到多样的新闻体裁，这里，无不交相辉映着民族报业一百年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报纸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报业的繁荣与民族的解放，报刊的兴盛与人的自由，联系是何等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报业发展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解放史，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人类文明的足迹。

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报纸与文明、与进步都是不可分的。进入二十一世纪，重读旧报，重温旧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种特殊的文化留恋，而且给我们一个立志不负前人的激励，一种为中华之崛起的鼓舞。

于是，百年报刊浓缩成一本美妙的书。

书评中的文学景观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中华民族在艰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了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不懈地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由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在上个世纪里为中国现当代文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折射着社会的转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景观的全面变迁。其中,又以文学作品为最。而书评,又是透视文学作品的一个棱镜。因此,在21世纪开始起步的今天,在文学的历程刚刚跨过世纪之门之时,我们萌发了将这一百零一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图景在书评这个小小棱镜中展现的想法。

一、世纪初文学的兴起

上个世纪初,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印刷事业的发达以及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白话的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

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初期白话散文中，游记、通讯报告也占有重要位置，稍后更有抒情小品、随笔出现。这些都属于当时所谓“美文”类。用白话写这类文字，足以打破“白话只能作应用文”的陈腐看法，含有向旧文学示威的意思。但在内容上，还是以抒写闲情逸致者居多。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在早年游记通讯中，应推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瞿秋白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拨开”国内外反动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实报导了“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那种复杂、尖锐而曲折的斗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许多篇章记述了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战胜敌人、排除困难的英勇业绩，表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生气勃发的革命气象。文学研究会在创作上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取得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人的创作，大多关切着现实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许多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作者各自的思想并不相同，对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但他们对当时黑暗污浊社会采取不满和揭露的态度则是大体一致的。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运动倡导者大多数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对文艺的特征又有所忽视，再加上不同程度地缺乏表现这类题材所必需的生活基础，这就使创作不能不受到影响。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这种功绩和弱点，在蒋光赤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一九二八年，叶绍钧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也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

二、四十年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品的现实性战斗性显著加强。现实斗争，尤其是动荡着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得到了较多同时也较为真实的描绘。“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表现抗日救亡的作品广泛出现。一部分作家参预或亲历实际革命斗争，使创作面貌继续有所变化，再现生活时的历史性具体性既有增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有些青年革命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发扬。茅盾的《子夜》在较大规模上真实地描画出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并揭示其未来动向，这是作者力图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相应的艺术手段观察和再现生活的结果。其间还出现了《家》、《雷雨》、《日出》、《骆驼祥子》等优秀作品。从文学样式方面看，长篇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个时期开始获得了较大的进展。

“七七”以后，抗战的炮火广泛地吸引作家关心现实，普遍激发起作家的爱国感情

和创作热情。许多作品迅速反映生活，歌颂前线和后方的新人新事，形式上趋于通俗。适应着战争初期形势的需要，诗歌、报告文学、戏剧都有较大发展，小型作品尤其活跃一时。乐观气息在一般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中也有所增强。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实际发展情形表明，只看到某些一时表象而产生的“乐观”幻想，很容易在形势比较严重时又一变而为失望悲观。抗战前期国民党统治区创作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暴露、讽刺和战斗的作品方面（《腐蚀》、《屈原》、《淘金记》等便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进入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们的创作，则由于在新的天地中放声歌唱并开始描写新的对象而呈现不同的特色。但不少作家世界观尚未根本改造而带来的一系列矛盾，也因新的直接面向群众、与群众相处的环境而逐渐地显得尖锐和突出。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在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可喜的贡献。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名篇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的形象，深入地反映了40年代解放区农村的变革。

出现较晚的解放区长篇小说大都注重表现重大题材。欧阳山1946年出版的《高干大》、柳青1947年完成的《种谷记》是描写农村发展生产的优秀作品；草明的中篇《原动力》是工业题材的成功之作；反映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斗争的作品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解放区军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为新英雄传奇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出现较早，接着马烽、西戎又合著了《吕梁英雄传》，两部小说深受欢迎。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是这一品种的最佳作品。

皖南事变之后，国统区中长篇小说硕果累累，这些作品已不再只流连于战争的表面描写，而是对战争背景下的现实生活进行深入的挖掘。这时期著名的作品有：茅盾的《腐蚀》，沙汀的以《淘金记》为代表的三部反映四川农村生活的系列小说，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钱钟书的《围城》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对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和作家必须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等方面所作的深刻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放区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到建国前为止，已出现了赵树理的小说、《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许多优秀作品。虽然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在建国前的几年中还只是一个开始，而且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解放区一般创作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广度和艺术表现力方面都还有不足之处，但整个文学创作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却适应了新的群众时代的要求，代表着一个新的方向，在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从“五四”时期起最初萌芽状态地存在着的社会主义文学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至此终于获得很大的发展，并成为我国整个文学的方向。

三、建国前后文学的新天地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长期被分离在两个地区（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终于“会师”，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战争中形成的解放区文化传统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合流了，并且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

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局面的结束，中国进入了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

从文学创作的方面来看，当时的大多数作家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下，确实有投合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极性，他们热情歌颂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战争文化规范在文学观念上的表现——诸如自觉强调文学创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觉运用战时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构思创作（即敌我阵营绝对分明），自觉强调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创作中体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小说成就最大的是那些反映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的作品。例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从1957年到“文革”前夕，长篇小说创作进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高潮。这时期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也都有很大进展。在表现中华民族勇于反抗、敢于胜利的优良传统方面，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李人的《大波》、欧阳山的《三家巷》等；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摧毁旧世界的斗争的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冯德英的《苦菜花》、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展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巨幅画卷的有：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康濯的《水滴石穿》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是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佳作。

四、文革中的艰难跋涉

1967年，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在《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此文称：“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文章中提到的重大斗争有：“第一次斗争，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第二次斗争，是1954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第三次斗争，是1954年到1955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四次斗争，是1957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1959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一条事实上不存在的因而在“文革”后被否定了的“黑线”：“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姚文元点名批判的这些对新文学事业作出过程度不等贡献的人，都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

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期间，《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在北京同时上演，演出二百一十八场。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称八个“样板戏”“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破产”。由此“样板戏”在“文革”中的主宰地位得以形成。分别是：《沙家浜》、《红灯记》、《智

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在这个打倒了所有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国家控制的传播渠道，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

1972年新创作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金光大道》等小说的出版，“文革文学”的话语建设进入了积极而有序的状态。新创刊的和恢复出版的文学期刊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为指导，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文革”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话语系统并且侧重表现两个方面：作为历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作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者都是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后者逐渐发展为侧重写与“走资派”的斗争。这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就成为“阴谋文艺”。《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典型发言》、《只要主义真》等这方面的代表作，因此受到主流文学评论的重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与《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是“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两极，介于这两者中间的作品是“文革文学”的基本方面。在主流话语中成为“阴谋文艺”的作品通常是由“政治人物”授意创作的。如《初春的早晨》、《第一课》、《金钟长鸣》、《西沙之战》、《小靳庄诗歌选》等。

五、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的新局面

1978年，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全面反思“文革”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禁锢。反映在文学上，刚刚从“文革”的灾难记忆里醒悟过来的人们，在反思历史和参与现实的拨乱反正中。这时期的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是在共和国初期的理想主义氛围下步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双百方针”时期因为真实地表达了对社会或人性的感性认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并在社会底层渡过了苦难的岁月，“文革”结束后他们重返文坛，成为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精神主题在当代的再现。还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在青少年时代过早地经受了被虚伪的理想主义所欺骗和愚弄的惨痛体验，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中感受到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所以当 they 开始写作时，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反映出新的民间化的创作趋向。

另外一些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借鉴，大大地开拓了表现现代人感情意识的艺术空间。起先对西方现代主义技巧的借鉴尚有形式主义的割裂感，但在许多作家的实践中渐渐地圆熟起来，新的语言形式融入了民族语言的表达经验，不是削弱而是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传统。尤其在现代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以“文革”时期知识青年的地下诗歌为源头的“朦胧诗”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现代诗传统结合起来，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这些虽然是表现技巧上的探索，但对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叙事话语的改变和个人立场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影响。80年代末期，“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喧闹是以“先锋文学”的中止为代价的。自“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意义

和价格不断被放大，“暴风雪”中的知青英雄，上任伊始的改革精英，忍辱负重的“李顺大”成了社会人文的神话。作家们在美好的理想破灭后，就将“形而上”的探究转变为对“形而下”的生存状态的观照描写了，新时期文学所特有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意识被消解在“烦恼人生”之中。“新写实小说”将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悲凉、失落和重构的努力基本上都涵括进来了。含而不露的语言，不事编造地展示生活之流的自然平实的叙述方法和结构形式，平静、冷漠、冷峻、不介入的视角，使其充分表现出对读者的尊重，也使读者将其轻易接受并认同了。“新写实小说”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冲击，它有所借鉴，有所创新，有人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

六、九十年代文学景观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加速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的格局相应地发生了调整，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最为活跃最为高涨的时期，但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种原因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他们在客观上难以维系以启蒙主义和精英意识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话语权力，同时也在主观上也开始反省自身的精英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浮躁和价值虚妄的缺陷。来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

首先是80年代文学思潮线性发展的文学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现了无主潮、无定向、的现象，几种文学走向同时并存，表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如宣传主旋律的文艺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门的经济资助和国家评奖鼓励来确认其价值；消费型的文学作品是以获得大众文化市场的促销成功为其目标的；纯文学的创作则是以圈子内的行家认可和某类读者群的欢迎为标志，出现了文学多种走向的自由局面。其次是作家的叙事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共同社会理想转向个人叙事立场。90年代有许多作家的社会历史观点非常接近，但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抒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几乎每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联系着他们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经验。其三，由于时代“共名”的消失，使一批面对自我的作家在开拓个人心理空间方面的写作实验得以实现。个人立场的文学叙事促使文学创作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转向更贴近生活本身的个人叙事方式，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应运而生。90年代的文学仿佛是一个碎片中的世界，作家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写作：有的继续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有的干脆表示要去认同市场脐脐发展中的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有的在思考如何从民间的立场上重新发扬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或者还有人转向极端化的个人世界，勾画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作家们在相对自由轻松的环境里逐渐成熟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写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堪称是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文学界的重要收获，也是本世纪文学舞台上的一道庄严神圣的落幕。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汉语（文化、文学和语言）语境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于传统和现代（后现代）观念之间、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先锋和保守之间。文学实践促使人们以新的文化认同避免和处理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而转换为对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文学所构成的“共享空间”的确认。以“五个一工程”为标志的官方文学，高奏主旋律，出现了一批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作品，精英文学作为严肃作者长期积累、由血到墨的成果，有《白鹿原》（陈忠实）、

《长恨歌》(王安忆)、《曾国藩》(唐浩明)、《雍正皇帝》(二月河)等小说和诗歌;大众文学以通俗的形式写世俗的凡事,但其过速增长的数量与循序渐进的质量尚不成比例。港台地区的通俗作品风行中国大陆。

九十年代初,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些作家弃笔从商的时候,陕西作家却突然爆出了大冷门。1993年,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健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相继在北京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且发行至几万、十几万册。再加上前几年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的贾平凹的《浮躁》,以及获得一片赞扬声的李天芳、邹志安、杨争光等作家的作品,陕西的作家确实给文坛带来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有人称之为“陕军东征”。

九十年代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中的艰难,为都市文学的勃兴提供了契机。深圳的《特区文学》和上海的《上海文学》开辟了以“新都市(市民)文学”为标榜的专栏、专辑。《车间主任》、《大厂》等也都触及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作家们以城市人的身分感受城市、理解城市、表现城市,分享着改革和现代化的困惑。一方面描绘城市人的精明、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凸显人们在商品、金钱、欲望、丑恶裹挟下的妥协和挣扎,寻找在文明被撕成碎片时人的价值与操守。文学中的女性话题和女性策略以其无可忽略的态势,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作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女作家自认是“化血泪为歌吟”的写作,是各自找到了女性和世界对话的方式。全国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女性文学思潮相当关注,专门设立了女性文学委员会,在1995—1997年间,分别以“女性文学的性质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当代女性文学的本体特征”和“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思潮特征与流向”为主题,举行了三届热烈的学术研讨会。女性文学专家、学者和女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就“女性意识和超性别意识”、“性别/位置/角色/属性”、“女人语言”、“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女性文学与人类精神命运”等问题进行了观点相异又互补的争鸣。而《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金蜘蛛丛书》、《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出版,对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也许经历了太多分外苍白的“大我演说”,也许经历了太多的“个性服从共性”、“少数服从多数”,一批作家作品破镜而出,专注于个人体验,或由“自我”的遭遇折射荒唐的历史阶段;或纯粹从个体角度书写私人生活、私人情感,如一些被称作“私小说”、“私散文”的作品。拒绝精神上的流俗,拒绝不自知间的遗忘,“个人化写作”体现了新的时代新的情绪对文学内在品质、个性溶剂与隐秘经验的正视和宽容。但如若一味“自言自语”,并陷入“自我设计”之障,未必不是破镜之后的又一次碎镜,达不到黑格尔老人所言“真正的自由的个性”。

进入九十年代,当人们回望八十年代曾几度“喧哗与躁动”的先锋文学,反思其何以越来越缩进少数作家和批评家的“圈子”,实验者热衷而接受者冷淡,对过于超前的“先锋文学”进行新一轮的艺术反拨已属必然。省视“先锋文学”生动和萎缩的过去,其间曾经追求过的合理的艺术理想及异质元素仍得以延伸,在新的创作中被吸纳进来。对“先锋文学”的调整呈现了三种取向:一是坚持走“精神圣地”之路,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仿”与“无仿”的问题暂且搁置)等,既有对传统文化新的叩问、追索或怀疑,也有对小说形态的借鉴与探寻;二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融合”现代主义的诸多因素,以“人文”特质的强化寻找现阶段文学与现时代精神的关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等;三是由“先锋”向“世俗”靠拢,一些曾在艺术实验上颇为“新潮”的作家,推出了直面世俗、明白晓畅的新作,如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伊始

《阿Q正传》

仲密

《阿Q正传》可算是鲁迅的经典之作，它最初是于1921年4月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后收入《呐喊》集。《阿Q正传》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现在已经被翻译为好几国文字，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了不少国际荣誉。最早评论这批文字的人有周作人、胡适、陈西滢、沈雁冰等。又有人将它编成戏剧、影视作品。现在“阿Q”二字还说在人们口头，写在人们笔下，评论文字若着意收集起来，不下数百则。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例来。

我同“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为约略知道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够加上一说明，帮助读者去了解他的真相，——无论好坏——也未可知。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美国福勒忒在“近代小说史论”中说，“关于政治宗教无论怎样的说也罢，在文学上这是一条公理：某种的破坏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设。讽刺在许多时代，如十八世纪的诗里，随落到因袭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讽刺实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姿态，对于不可忍受的风习之正义的愤怒的表示，对于在这混乱的世界里因子邪两腐败而起的各样侮辱损害之道标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因此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最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的有净化力的情绪。即使讽刺是冷的，如平常变为反语的时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们为了比私利更大的缘故而憎，而且在嫌恶卑劣的事物里鼓励我们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这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他复写在纸上，所以他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作成人生的“实物大”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够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

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现代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多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形现形记”和“怪现状”等多是熟写，性质很是不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阿Q正传”的书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戈果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戈果理的“外套”和“疯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沈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我是猫”。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压迫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词，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 Sa tyria satire(山云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

目录

总序 文章报国 薪火相传

引言 书评中的文学景观

第一章 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 与评论 (1901~1918)

第一节 晚清诗歌

诗界潮音集 中华书局《文苑谈往》 1946年8月 2

人境庐诗草 北新书局初版《秉烛谈》 1940年2月 3

第二节 谴责小说

《官场现形记》 世界繁华报馆版《官场现形记》 1903年 5

文明小史 《新小说》第一卷第五期 1935年6月 6

评《九名奇冤》 《晨报副刊》 1924年12月8、9日 8

《孽海花》在晚清文学中之地位

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小说闲谈》 1936年 10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总评

上海广智书局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910年 12

《老残游记自叙》 天津日日新闻版《老残游记》 1906年 13

《老残游记》二集自叙

天津日日新闻版《老残游记》 1907年 13

第二章 新文学的发展 与理论建设 (1919~1936)

第一节 “五四”新文学伊始

《阿Q正传》 《晨报副镌》 1922年3月19日 16

《沉沦》 《晨报副镌》 1922年3月26日 17

《一叶》的评论 《创造季刊》 1923年2卷1号 19

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文艺春秋》 1945年第2卷第1期 21

《繁星》与《春水》

《创造周报》 半年汇刊第1集第12号 23

读《柚子》 《小说时报》 1927年18卷7期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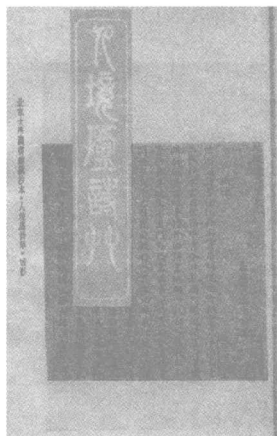
第二节 革命风雨中茁壮成长

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

《图书评论》1933年4月1卷18期 26

读《子夜》 《读书与出版》 1933年 27

新月志摩纪念号 《读书月刊》 1933~1934年 29



《小小十年》 《大公报》 1930年3月10日 30
 《出奔》 《大公报》 1935年11月4日 31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文学》1卷5号 1933年11月 34
 萧红作《生死场》序
 上海容光书局版《生死场》 1935年12月 36
 评巴金的《家》《春》《秋》
 江西《艺文集刊》1辑 1942年8月 37
 论《骆驼祥子》 《文艺新辑》1期 1948年10月 39
 评《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
 上海《大公报》 1947年2月21日 41

第三节 日益成熟的现代文学

歧路灯 《一般》 1929年6卷4号 66
 读《湖畔》诗集 《文学旬刊》39期 1922年5月18日 43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清华周刊》 1917年12月4日 44
 《冬夜》评论 《清华周刊》 1922年 45
 《女神》之时代精神 《创造周报》4号 1923年6月3日 47
 《故事新编》 《大公报》 1936年2月21日 84
 《南行记》 《大公报》 1936年3月6日 51
 《九十九度中》 《大公报》 1935年8月18日 52
 《雷雨》(四幕剧) 《大公报》 1935年8月31日 53
 《雾》《雨》与《电》巴金的“爱情三部曲”
 《大公报》 1935年11月3日 56
 边城 《咀华集》 58
 老舍先生《离婚》的评价 《大公报》 1935年8月4日 61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

文学发展(1937~1945)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文学评介

中国及中国人 《图书季刊》 1940年 3卷1-2期 64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整风以后的文化副刊

——《新华副刊》

谈夏衍底《法西斯细菌》 《新华副刊》 1942年12月30 117
 《关于〈孔雀胆〉》 《新华副刊》 1942年12月31号
 永恒的石碑——《伤逝》 《新华副刊》 1943年4月11号 68
 刘白羽的《太阳》 《新华副刊》 1943年6月28号 69
 诗人的偏爱——读臧克家著《泥土地歌》
 《新华副刊》 1943年10月 69
 姚雪垠的文学语言观 《新华副刊》 1943年 71
 知识分子改造的起点——读张天翼作《新生》有感
 《新华日报》 1943年7月26日 73

第三节 沦陷区的期刊文学

热闹·沉重·风趣——谈三个多幕剧
 《读书青年》 1944年1卷1期 74



知识分子的道路——读韬奋的《经历》

《群众》 1943年10卷2期 76

读《倾城之恋》 《海报》 1944年12月10日 77

左兵《天下太平》 《文学杂志》 1937年1卷4期 78

桥 《文学杂志》 1937年1卷3期 79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1943年11月13日 81

两篇小说——丁玲《在医院中》和路翎的《谷》

《人世间》“书人书事”专栏 1942年 82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

文学和批评(1946~1949)

第一节 延安解放区的文艺创作

吕梁英雄传(上册) 《解放日报》 1946年6月15日 86

洋铁桶的故事 《解放日报》 1946年8月16日 87

从《王贵与李香香》谈起

《解放日报》 1946年9月22日 89

关于《李有才板话》 《解放日报》 1946年8月26日 91

饥饿的郭素娥 《青年文艺》 1944年1月6日 92

关于《升官图》 《解放日报》 1946年10月16日 94

四世同堂 《读书与出版》 1946年2期 96

第二节 活跃的海上海文艺期刊

清明前后 上海《文艺复兴》 1946年1卷1期 97

三个中篇——《脱缰的马》《遥远的爱》《饥饿的郭素娥》

《文艺复兴》 1946年2卷1期 98

五个战时剧本 《文艺复兴》 1946年2卷4期 102

十年诗选 《文艺复兴》 1946年2卷5期 109

沙汀的《困兽记》 《文艺复兴》 1947年3卷5期 113

一个中国新诗人 《文学杂志》 1947年2卷2期 116

滩 《文学杂志》 1947年2卷4期 119

读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 《民国日报》 1948年10月 121

狂欢之夜 《人世间》 1946年 124

第三节 京津及香港地区书评小览

《鸭嘴涝》读后 《抗战文艺》 1944年第9卷第1、2期 126

读萧乾先生《南德的暮秋》

天津《大公报》 1947年3月1日 127

读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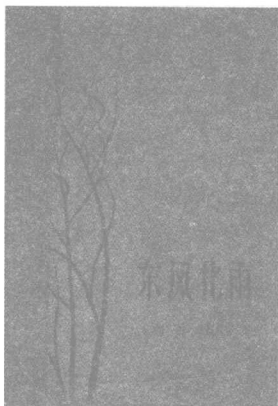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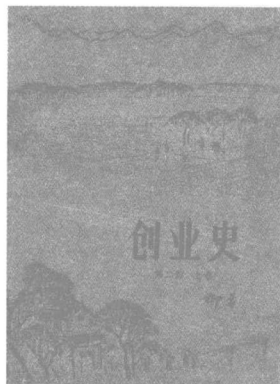
天津《大公报》 1948年10月31日 129

《虾球传》的启示 香港《大公报》 1949年2月21日 130

第五章 新中国文学的新局面

(1950~1966)

第一节 长篇小说的繁荣



- 暴风骤雨 《文艺报》 1952年11月12日 136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文艺报》 1952年10期 138
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文艺报》 1958年3月 139
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
《文艺报》 1958年5期 141
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
《文艺报》 1958年13期 143
喜读《红日》 《文艺报》 1958年14期 145
运用评书形式反映伟大斗争的好作品——读《烈火金刚》
《文艺报》 1958年24期 146
李双双：一代农村新人的典型——《李双双小传》
《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论评》 1997年 147
初读《创业史》 《文艺报》 1960年1期 148
《山乡巨变》琐谈 《文艺报》 1961年2期 149
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读《三家巷》
《文艺报》 1960年2期 150
读《风云初记》 《文艺报》 1963年2月20日 152
- ## 第二节 “左”倾思想干扰下的文学评论
- 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
《文艺报》 1955年24期 153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的反动性质
《文艺报》 1957年9月8日 154
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
《文艺报》 1959年4期 156

第六章 百花凋零的文革时期 (1966~1976)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摧残

- 彭德怀篡军反党的铁证——批判大毒草《保卫延安》
《文艺批判》 1967年12期 160
《欧阳海之歌》的成就和意义 《文艺报》 1966年3期 163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解放日报》 1966年5月10日 164

第二节 文化专制主义下的“无产阶级文艺”

- 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胜利 《人民日报》 1967年5月1日 166
无产阶级文艺的一盏红灯 《人民日报》 1967年5月29日 168
《海港》好得很 1967.5.28 人民日报
工人群众评《智取威虎山》 1968.9.29 人民日报
从桃园看反动小说《风雷》 《人民日报》 1968年7月17日 171
让红星永远闪耀在青少年心中
《人民日报》 1972年8月2日 172